

《秦妇吟》之敦煌传播新探

——学仕郎、学校与诗学教育

田 卫 卫

内容摘要:韦庄《秦妇吟》自再现于敦煌藏经洞以来,虽有诸多学者从史学、文学、思想、艺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但鲜有从教育角度详细探讨者。而从现存《秦妇吟》文本来看,半数以上的写本都留有学士郎书写的题记,且分处于寺学、私学等不同的教育背景之下,体现出其本身教材性质的一面,以及敦煌地区教育情况的一角。本文根据一应题记,梳理《秦妇吟》在敦煌的传播情况,分析其作为教育内容进行传播的范围和原因。

关键词:《秦妇吟》 敦煌 教育 题记

20世纪初,全文失传千载的韦庄《秦妇吟》诗篇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再次面世,并随即引起王国维、罗振玉、翟林奈等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撰写多篇题跋和考证文章。迄今为止的百餘年来,学界仍不断出现关注研究之人,并先后于英藏、法藏、俄藏、日藏等多家敦煌文献收藏单位发现了《秦妇吟》写本的踪迹。笔者统计迄今为止各位前辈学者的成果,共计发现写本11件,这些写本可分为14个编号,其中6件带有题记^①,分别记载着它们曾经从属于寺学学子、私学学子以及普通百姓的情况。

笔者对中国中古时期文化的空间传播与时间传承等问题有一些兴趣,而现存《秦妇吟》写本半数存有题记的情况正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信息。最一目了然的一点就是,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秦妇吟》既在敦煌民间受到百姓们的喜爱,也曾经作为学习的教材在敦煌各个不同学校的学子间广为流传。因此,笔者希望根据题记所提示的信息,探讨《秦妇吟》与敦煌学校的关系。不论寺院学校还是世俗学校,都是教书育人之地,而关于敦煌的学校教育,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不少有分量的著述,限于学力,笔者在此仅以《秦妇吟》写本为中心,引证其他文献实例,结合自己的关注点,从学子称谓、学校教材等方

^①田卫卫:《〈秦妇吟〉敦煌写本新探:文本概观与分析》,《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

面出发,略谈一下《秦妇吟》写本在敦煌的传播对象与传播范围,及其在敦煌的社会地位与在诗学教育方面的影响。

一、传播的主要群体——学仕郎

现存的十一件《秦妇吟》敦煌写本中,S.5476 缺失首尾,Дx.4568、Дx.10740 (6-11)+Дx.4758、P.3953 三件为仅残存小碎片的写本残文,P.3910、Дx.6176 仅有开头, S.5477 缺失文首,所以,从内容上来说,能直接被称为完本的不过 P.3381、羽 57R+S.0692、P.2700+S.5834、P.3780 四件而已。即便如此,如今我们却能够从这些《秦妇吟》写本的首题、尾题或者背题、杂写中,看到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寺弥、百姓等共计六种不同的署名和称谓(如下表所示)。

编号	纪年	题记信息	
		位置及文献名	身份、姓名
P.3381	905	《秦妇吟》卷尾	天复伍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
羽 57R+ P.0692	919	《秦妇吟》卷尾	尾题:贞明伍年己(己)卯岁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写记 背题:见金光明寺学郎索受成
P.2700+ S.5834	920	《秦妇吟》卷尾	贞明陆年岁在庚辰拾貳月
P.3780	957	《秦妇吟》卷尾、卷背	尾题:显德二年丁巳(巳)岁二月十七就家学士郎马富德书记 大周显德四年丁巳岁(957)二月十九日学士童儿马富德书记 背题:丙子年(976)五月十五日学士郎杨定迁自手书记之耳□
P.3910	979/ 983	《茶酒论》等卷首、卷尾	文首:泛孔目学士郎阴奴儿 ^① 背面杂写:净土寺寺弥赵员住 卷首: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阴奴儿□□□ 卷尾:癸未年二月六日净土寺〔沙〕弥赵员住左手书之。
P.5477	?	《秦妇吟》行间	阴奴儿(见 P.3910 泛孔目学士郎)

根据表格中的纪年题记信息可知,至少早至公元 905 年的天复五年,晚至公元 983 年的癸未年,不同称谓的人们一直在抄写和阅读《秦妇吟》。虽然《秦

①阴奴儿题记多见,如 S.5256《新菩萨经》卷末“戊寅年(978)四月五日阴奴儿写经一卷”(《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7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8 页),S. 5441《捉季布传文》首页“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二月廿五日阴奴儿书记”(《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7 卷,第 83 页),等等。

妇吟》的抄写者自我称谓不尽一致,但这一现象并不与敦煌所出的其他写本文献的题记情况相矛盾。《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以及佛教典籍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敦煌写本中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如《太公家教》,P.2825 末题记云“大中四年(850)学生宋文显读、安文德写”,P.2937 卷背题有“维大唐中和肆年(884)二月廿五日沙州敦煌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试太学博士宋英达”^①,P.2825 背题“大顺元年(890)十二月李家学郎”,P.3569 末题“维景福二年(893)十二月十二日莲台寺学士索威建记”,P.3764 末题“天复九年(909)己巳岁十一月八日学仕郎张△乙午时写记之耳”,分别有学生、学士郎、学郎、学士、学仕郎等至少五种自我称谓。再例如《论语集解》,散 665(罗振玉旧藏)卷一末题“大中五年(851)五月一日学生阴惠达受持诵读、书记”,P.3441 卷六末题“大中七年(853)十一月廿六日学生、判官高英建写记”,P.2716 卷七末题“咸通五年(864)四月十二日童子令狐文进书记”,P.2681 卷一卷端题“大唐乾符三年(876)三月廿四日学士张喜进书记之也”,P.3192 卷六背题“伎术院礼生翟奉达”,也是有学生、童子、学士、礼生至少四种自我称谓。实际上,如果细细翻阅其他文献,还能举出不少类似这样的例子。由此可知,有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沙弥等共计五种不同的署名和称谓的学子同在抄写《秦妇吟》一事并非特例,当时《秦妇吟》与其他基础读物一样,是广为学子学习抄写的内容。

那么,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呢?P.3780 中的两行题记或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线索。一行为“显德二年^②丁巳岁二月十七就家学士郎马富德书记”,一行为“大周显德四年丁巳岁(957)二月十九日学士童儿马富德书记”。此处姓名同为一人,且年代皆为丁巳年,所以“学士郎”与“学士童儿”应当是相同的含义。除此之外,联系其他文献的题记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侍郎、学使郎、学郎等说法都较为接近。对于这些不同的称谓,李正宇认为,敦煌学郎的称谓变化具有时代性,敦煌学生称学仕郎始于晚唐,最早为 862 年写《孝经》(Дх.3867v)^③。林聪明基本与李氏持相同意

①此处题记或为学郎涂鸦。在这里,宋英达既是学问知识水平不高之“敦煌学士郎”,又是地位极高的“兼充行军除解试太学博士”,明显与当时官制规定不符,所以此处或为学仕郎心中憧憬的表现。宋英达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学而优则仕”,达到这样高的职位,但以他目前学仕郎的身份和学识,明显对当时官制了解的不太清楚,所以就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描绘了一个自己最向往的职衔。

②此处显德二年与下显德四年皆为丁巳岁,显然有误,以后者为是。

③李正宇最早对敦煌学郎题记做了专门辑注,共获得题记 144 条。他将这些题记按照纪年情况分为四组,其中第一、第二组因纪年较为清晰,所以是通过编年式顺序排列资料;第三、第四组仅大致推测为晚唐、五代、北宋时期,故根据同校诸条类聚为序。后两组主要是作为前两组的补充和辅助。根据这四组材料,可以一窥敦煌学校设置、学郎读写范围、学郎称谓变化等现象(详见《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 年第 1 期,第 26—40 页)。

见,他在指出当时敦煌学子称谓的多样性是由于时代迁移而发生了改变的同时,还明确指出这些不同的称谓实际上是异名同义,都是指代求学的学子^①。根据前表所列目前已知题写有确切年代以及明确身份的题记来看,其分布情况正如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学子们的称谓有一定的时代性。中古时期的敦煌,学子们的自称隐约呈现出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过程。虽然并非楚河汉界般明显、也并非一种称谓对另一种称谓的完全替代,但是的确在较长时间段里发生了流行称谓的改变,比如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为学郎、学士郎、学仕郎,此现象相对明显。

目前,敦煌文献中可见的最早的学生称谓是 P.2643 (书写于 756 年)题记中的“义学生”^②,虽然仅此一个孤例似乎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③,但是根据此后的完全空白期,我们可以推断,在八世纪中叶之后,“义学生”很可能不再是敦煌学生们的自我称谓用语。在这段空白期,有 16 件自称“学生”的题记出现在 815-879 年之间,之后则是“学士”称呼。而在“学士”之前发现过两条自称“学郎”的题记。在“学士”较为集中出现的 876-893 年,也有四件“学士郎”题记和两条“学郎”题记。从 890-990 年,题记中的自称基本皆为“学仕郎”、“学士郎”、“学郎”。根据这些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当时学子称谓的变化主要是表现在从“学生”到“学仕郎”的变迁。“学生”一词与唐中原内地的传统说法一致,易于理解,毋庸多谈。“学仕郎”一词则在中原典籍中完全不曾出现过^④。如果单从字面来看,“学仕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学而优则仕”这句古语。古代读书人的学习目的大多都是为了考取功名,通过科考出仕,博取一个好前程。所以,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寓意,后来有人用“学仕郎”来称呼正在就学的“童子”、“学生”。又因为“学仕郎”比“学生”一词更为文雅、更有寓意,所以在敦煌逐渐流传开来,取代了“学生”、“童子”等称呼。与此同时,与敦煌地区整体居民的文化训练水平相关,也与敦煌地区当时大量使用别字、俗字的文化背景相关,“学仕郎”不时被误写成“学侍郎”、“学使郎”,或简化写成了

①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第166页。

②P.2643的书写内容为《古文尚书》,如果联系唐代中原内地学生的学习情况来看,两者是一致的。在唐代一些诗人童年生活的描述中,也可以见到抄写《尚书》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是由制度决定的。根据《新唐书·选举志》的选举标准来看,能否很好的掌握《尚书》,是影响学生以后仕进前途的标准之一。

③众所周知,吐鲁番有自称“义学生”的12岁学子“卜天寿”,或可为敦煌地区学生年龄的推测提供参考。但因地区不同,本文暂不将其列入讨论范围。

④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不到“学仕郎”一词,也未在今人研究论著中见到提及或讨论传世典籍中这一词汇的记载。

“学士郎”^①。所以,很可能“学侍郎”、“学士郎”、“学仕郎”、“学使郎”为同一自称的不同写法。其中,学生们可能知道有“侍郎”这一官职^②,因此“学仕郎”误写成了“学侍郎”。“学士”、“学仕”则为其进一步的简化称呼或漏字,“学郎”则是对以往称呼的沿用。在这样称谓变动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学习、并且水平并不高的学子们,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也就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写本上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称谓题记和杂写,于是,最终出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再谈一下学仕郎称谓的使用范围。如前文所述,题记中署名“学生”、“学郎”、“学仕郎”等称谓的文献范围很广,在儒典、佛经以及变文或各色通俗文学作品中皆有出现。与此相对,检阅《通鉴》、两《唐书》等所谓的正史材料可以发现,虽然“学生”这一称呼在历代传世史料中并不少见,但是“学士郎”、“学仕郎”等称呼似乎完全未见于出土文献以外的史册资料,这或许可以说明“学仕郎”称谓是民间的地方性称呼,而并非唐代的官方称呼。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认为,这样的称谓其流行区域是有限的,所以传存下来的其他地区的文人轶事类文章,以及唐宋的笔记小说、诗歌创作等文学作品中,均不曾见到使用“学仕郎”称谓的例证。

对于敦煌地区学仕郎身份的定义,在求学学子这种基本解说的基础上,也可以再进一步探讨,部分题记中记载了学仕郎兼有职务的情况,列举题记内容如下:

1. S.707《孝经一卷》末题“同光三年(925)乙酉岁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学仕郎郎君曹元深写记”^③;
2. S.1893《大般涅槃经》卷三七末题“经生敦煌县学士苏文鵠书”^④;
3. P.2681《论语》卷一并序卷首题“维大唐乾符二年(875)二月廿四日沙州敦煌县归义军学士张喜进书记之也”^⑤;
4. P.2841v《小乘三科》背题“白侍郎门下学仕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⑥;
5. P.2937《太公家教》背题“维大唐中和肆年(884)二月廿五日沙州敦煌

①虽然也存在因为崇尚“翰林学士”等文士而改“学生”为“学士郎”的可能,但笔者以为,由“士”字的简单写法误写成“仕”、“侍”、“使”等复杂笔画用字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且“学仕郎”写法出现的频率较高,“学而优则仕”又是学习的一大动力,故认为其本意当以“学仕郎”为是。

②敦煌文献中存有白居易白侍郎的诗歌,故此推测接触过题名白侍郎诗歌或者称为白侍郎门下弟子的学郎有将“学仕郎”误写为“学侍郎”的可能。

③《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3页。

④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70页。

⑤《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郡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①太学博士宋英达”^①；

6. P.3197v《新撰时务纂集 珠玉要略抄一卷》背面杂书“圣教技术院学士敦煌礼生翟奉达”^②；

7. P.3441《论语集解》卷六末题“大中七年(853)十一月廿六日学生判官高英建写记”^③；

8. P.3906《字宝碎金一卷》末题“天福柒年壬寅岁肆月貳十日技术院学郎知慈惠乡书手吕均书”^④；

9. P.4044d《修文坊巷再缉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都勾当技术院学郎李文进”^⑤。

从上文例句可以看出,学仕郎水平参差不齐,不仅有字迹优劣之分,而且还有整体水平的高下之判。部分水平较高者,可能已担任书手或判官等其他职务,如例7、例8。但是,由于难以判定学仕郎题记所署职务的真伪,也不能排除学仕郎信手涂鸦、一时兴起的习字与杂写(如例5),以及学仕郎期待自己将来担任某一职务的美好希望,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并利用一些题记与杂写,比如例5存在着太多令人费解之处,有的是不合官制,有的是词句不通,总之不能简单的当成学仕郎的实际职务来看待。

另外,弟子以及子弟、礼生等自称也时有所见。这都是一些身份特殊的学生,或者是学习专门技术,或者是表示自己学力优秀,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跟普通的表明学生身份的自称无疑也是有所不同的。

二、传播的范围及影响——学校与诗学教育

关于敦煌学仕郎的学习情况,前辈学人已经多有讨论。

李正宇认为,自唐武德二年(619)到被吐蕃占领(786),敦煌学校大致可以分为州学、州医学、道学、县学、义学五类^⑥。据《新唐书·选举上》:“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又据《旧唐书·地理志》,沙州为中都督府,即沙州州学的学生数应该是六十人。另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沙州条记载沙州“管县二:敦煌、寿昌”,且敦煌为上县,寿昌为中下县。故敦煌县学当为四十人,寿昌的县学学生数当

①《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②《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③《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④《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⑤《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⑥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173-192页。李正宇认为吐蕃占领敦煌是建中二年(781),后来学界较为赞同敦煌陷蕃在786年说,故此处对李说小有修正。

为三十五人。据 P.2005《沙州图经》记载可知,“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县学,又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①。寿昌县稍远不论,仅敦煌县境内,因为有敦煌州学毗邻于敦煌县学东侧,故此一处即至少汇集百名官学学子,颇具规模。州学方面有“经学博士”教授“五经”^②;医学方面有医学博士行医并教授医学生^③;道学亦有道学博士^④;县学有教授经术的博士以及助教;义学则是百姓私学和乡里之学^⑤。李正宇还认为,义学生与官学生是相对而言的,义学也包括寺院学校。但是在敦煌陷蕃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吐蕃的占领,敦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都发生了改变,之前可见于文书中的各类官学已经不见踪迹,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的寺学相关文献。佛教寺院本身有“三学院”教授“经、律、论”,但这里所说的“寺学”与佛教本身的学院有别。在敦煌陷蕃之后,之前社会上以进入州学、县学等官学求学为目标的学子们也转到寺院接受教育,一些避入寺院的有文化的“破落官”带入寺院更多的世俗学问,他们利用寺院这种“公共空间”来发展学校教育,所以寺学的教授内容也因之扩大了范围^⑥。比如张侗在战乱时期,就暂时于寺院教授学生学习儒家典籍。而《秦妇吟》被选为教材,有可能就是“破落官”教师的选择。他们由于亲身经历了敦煌被吐蕃占领后自身地位的下降以及昔日风光不再,所以对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当《秦妇吟》传来敦煌后,因为其具有押韵整齐、用词通俗、描述细腻等艺术创作上的特点,以及记述真实详细等内容上的优长,令这些“破落官”们立刻产生了共鸣,于是很快将其选入教材,流行一时。

实际上,在李正宇、伊藤美重子等前人基础上收集学郎相关题记可知^⑦,关于学仕郎们的学习教材,目前已经收集到一百四十余条题记。从其抄写的内容可以看出,学仕郎们的书写范围是内外典皆备的。虽然寺学记录众多,但佛经

①《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②目前发现的材料有《尚书》、《易经》、《左传》、《穀梁传》、《礼记》、《尔雅》、《毛诗》、《论语》、《孝经》等。

③目前发现的材料有《本草》、《脉经》、《五脏论》、《食疗本草》等。

④学习《老子道德经》、《庄子郭象注》、《文子》等。

⑤虽然具体范围不是很清楚,但是根据现有信息可知,其学习的典籍包括《古文尚书》(P.2643)等内容。

⑥参见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等出版,2008年,第101-117页。

⑦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26-40页。伊藤美重子:《敦煌文書にみる学校教育》,汲古书院,2008年。

仅仅 20 件左右,约占总量的六分之一。相比较之下,被伊藤氏称之为“敦煌的规范教育”的童蒙类内容则占更多比重,如《开蒙要训》、《千字文》、《兔园策府》、《珠玉抄》、《百行章》等有 20 余件。《论语》等“五经”书的相关文书约 18 件,《孝经》相关内容文书有 9 件,其他《秦妇吟》、《燕子赋》等俗文学也占了很大比重。可见,作为学仕郎的学习内容,童蒙类的作品较多,这无疑说明学仕郎们学识水平不高的状态,解释了何以寺学中教授的内容以世俗蒙书为多,也说明虽然寺院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老师,但是他们也一样使用世俗学校的启蒙读物,一样遵循中原内地学书习字的传统。上述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 850 年至 986 年之间,该时期正处于归义军统治期,敦煌寺学教育兴盛,包括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这样身份的人也就学于寺院。

伊藤美重子曾将所有书写学郎题记的写本分为:1)经书、千字文、道经;2)通俗文学作品;3)教训书;4)字书、类书;5)实用书;6)佛教文献等六大类列表讨论^①,但在笔者看来,所有的教材选择从整体上不外乎宗教、世俗两途。如《秦妇吟》、《王梵志诗》、《李陵苏武往还书》等文学作品,很可能都是因为它们如同《三字经》一般通俗易懂且又朗朗上口,而这些教材的大致内容还颇有教育学仕郎自小注意道德修养,有让他们从小培养修身齐家、孝悌仁爱等思想教育意义的原因,所以在学习时被作为知识和品德修养双重作用的教材来教习学仕郎,以期望他们将来能品学兼优。之前大家关注学仕郎的学习教材多是从学生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可是笔者认为,在统一教授学生的学校,比较实际的做法往往是由老师确定学生们的教材,这些教材体现的是老师们根据自身经验,对个人人生与整体社会的理解,他们根据自己认识到的书籍的实际社会功能和个人可能的知识需要,确定给学仕郎所要灌输的思想,从而最终形成了学仕郎的教材范围。

从目前已知《秦妇吟》写本情况来看,字迹大多颇为拙劣,基本可以确定为初学者所书。十一件写本中书题记的都是求学学子,其中至少有三件是属于金光明寺、净土寺等寺院学校的学郎。再加上敦煌藏经洞文献或为三界寺资产,所以可以推测,被教师们选为授业教材的《秦妇吟》,以金光明寺、净土寺、三界寺等寺院的实际地理位置为中心,以学子们的活动范围为辐度,向外界社会进行着辐射式的传播。根据李正宇的调查结果,金光明寺为敦煌著名僧寺,简称“金”,最早见于吐蕃占领期辰年(788),最晚可见于《天禧塔记》所载之北宋天禧三年(1019)。而且据 S.3905 可知,该寺屋宇曾于光化末回鹘入侵时毁于战火,后于天复元年(901)重建,其地理位置坐落于沙州城西北(P.2856V2、S.3905)^②。三界寺简称“界”,寺址在敦煌莫高窟前^③。净土寺,敦煌著

①伊藤美重子:《敦煌文書にみる学校教育》第二章。

②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第 77 页。

③参见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4-29 页。

名僧寺,地址在沙州城内(P.3224、P.2032)^①。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拥有《秦妇吟》的学子们并非同处于敦煌境内一隅,而是沙州城内、沙州城西北、沙州城东南皆有分布^②。分处于敦煌城各个方位的金光明寺、净土寺、三界寺等寺院,却都存在抄写、保存《秦妇吟》作为学校教材的情况,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寺院中的教书先生对《秦妇吟》的评价一致、印象良好,所以都选中《秦妇吟》作教材,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敦煌地区,各学校之间选用教材的互相参考、彼此通行。

那么,敦煌学校选择《秦妇吟》为教材的主要出发点是什么?习字?学史?亦或其他?虽然习字、临书等目的兼而有之,但是最主要的出发点,很有可能是与其他俗文学作品的学习一样,在学习字词、了解时事的同时,主要培养学郎们的诗赋水平。唐朝科考有专考诗赋者,由此进入仕途,往往多得清要职位,既无冗杂的政务,又广受尊重,是备受尊崇。虽然敦煌能达到此等水平之人不多,但无疑这样的水平地位是每位读书人的梦想和憧憬,所以虽然学郎们对朝堂之事或许了解不多,但是教授知识的先生们却觉得这些是有必要让学郎掌握的技能,所以在选择教材时,会选择这样既能包含历史事件、又广受推崇、且韵律合宜的诗歌,训练学郎们在对答时策、了解史事、吟诗作对等各方面的能力。根据如此的标准来看,则《秦妇吟》、《秦将赋》等诸多文学作品皆为上选。而据目前发现的文献比例来说,在有学郎题记的俗文学作品中,《秦妇吟》是存数最多者之一。这很可能是因为《秦妇吟》是近期新兴作品,受到更多关注的缘故。由于《秦妇吟》是对逝去不远、恍如昨日的最新重大事件的记叙,所以民众们了解的欲望也比较高涨,教师们的感叹也一定很深,在这样的情况下,周边人们的关注促使学校学郎加倍抄写《秦妇吟》。比如目前已发现两件阴奴儿所写的小小的册子本,应该就是这位学郎日常随身携带、诵读学习之物。

由此可知,《秦妇吟》的流布必然不限于学校一庭一院,有传播到往来学校的师生以外之人、学郎家人、学郎往返学校与住宅之间所途经之里巷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毋庸置疑,在学校学子之间作为教材而流传的《秦妇吟》,不仅身份上从普通诗歌上升为学习典范的地位,拥有了某种权威性,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词也天然具备着深入民众中间的亲和力,妇孺老幼易于记诵,所以可以说,学校教育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非常有益的助力^③。这一方面体现在对于传播深度的影响。如果用妇孺皆知来形容《秦妇吟》在敦煌的流传,应该并不为过。关于《秦妇吟》在学校学仕郎之间的传播,从诸多题记上来看,有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就家学士

①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第82页。

②至少还应该再包括沙州城北,因平康乡的习书人也在抄写《秦妇吟》。

③参见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91-192页。

郎马富德、学士郎杨定迁、净土寺沙弥赵员住等多位学郎童子抄写、学习和诵读,已经达到了多家学校学郎传诵的程度。应该说,学仕郎不太可能完全将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截然分开,必然有回家之时,也有跟父母交流沟通的一刻。这就不能不说《秦妇吟》有学子传于其父母兄妹的可能性。而由于《秦妇吟》语言的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在中原也是被制为幛子的存在,所以虽然敦煌是否有人制为幛子未为可知,但是,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可以想见的。

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在对于传播广度的影响。学校是教育机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广泛传入敦煌多处大街小巷之中。可以说,从学校到家庭、到市井都有可能传播开来。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学校与住宅之间,反复经过市井之中,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到市井的传播机会。已经掌握《秦妇吟》的学仕郎,他们作为传播的主体,在各自的空间活动范围内有向外传播这首脍炙人口的长诗的可能性,从而扩大了《秦妇吟》在敦煌社会上的传播广度。而且从其传播广度上也可以看出敦煌统治阶层以及归义军政府对《秦妇吟》的态度。在中原被公卿“讶之”的《秦妇吟》,到了敦煌却如鱼得水般地广为传诵,这也体现了当权阶层对描写中原帝王腐败无能、将领残暴无义、唯利是图的行径是无所避讳的,他们并不会对这样的描写认为有何不妥,也不会对《秦妇吟》垂讶或禁止,而是正好相反,还要任其广为流布,传播于市井孺子之口。这似乎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九世纪末以后敦煌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那种互相寻求支持、而又貌合神离的关系。

三、小结

通过以上材料的列举以及相关分析,大致对《秦妇吟》写本在敦煌传播情况的轮廓进行勾勒,并对其给予敦煌学校教育、尤其是诗学教育方面的影响略作说解,总结如下:

根据现有的百余条学郎题记情况来看,学郎称谓存在时代性的变化特点。虽然有所交错,但主次可以说是较为明显的。学生、学士、学仕、学士郎、学仕郎、学士童儿等称谓都是广大学子的代名词,虽然他们在年龄、学力、水平等方面有一定的差距,部分优秀者已经可以担任经生或者书手的工作,但他们所代表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都是指代求学的学子。被赋予这些称谓的学子们,在不同的年代分处于寺学、私塾家学等各式学校之间,他们广泛地学习着多种文献,既书写儒典、佛经,也抄录文学作品、应用文书。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在人数上有一定的规模,在时间上存在长期的延续,在地理上也根据就学学校不同,于敦煌境内多处里巷皆有分布。当《秦妇吟》传入敦煌后,因为种种因缘际会,也成为他们的抄写对象之一。于是在这样一个学习、教育的圈子里,至少在物质形态的表现方面,《秦妇吟》以册子本和卷子本等形式,在学校学子之间

得到了广泛的流布与传播。

通过诗学教育以及传播范围的影响可以看出,在统治阶层不设栅栏的默许态度之下,敦煌的学校教育对《秦妇吟》的传播给予了很大的促进。由于《秦妇吟》本身韵律朗朗上口、内容通俗易懂,以及颇有些符合“时务策”的性质^①,能给予学习者盛衰兴亡警示的教育作用,敦煌学校将之定为教材的行为,给予《秦妇吟》正统、合法、堪为经典的地位。再加上不仅有纵向的传承影响,使得代代相传成为可能,而且从学校向外辐射,扩散到社会,使得妇孺老幼口口相传也成为可能。所以,作为诗学教育而持续、广泛进行的敦煌学校的教授加大了《秦妇吟》的传播力度,甚至很可能进一步奠定了《秦妇吟》在敦煌民众心目中诗赋教育经典地位的基础。

《秦妇吟》作为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作为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所有诗作、在三唐歌行中也是不二之作的优秀作品,吸引了文学、史学等各界学者的诸多关注。本文在学习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秦妇吟》敦煌写本中所存题记为线索,探索其传入敦煌后流传的范围、深度和原因。

【作者简介】田卫卫,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史、敦煌学。

^①虽说在唐末时期的敦煌,可能已不再举行科举考试,但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基于传统的教学习惯,仍有可能把为了应对考试“时务策”的教导方式继续下去。姑为一说。